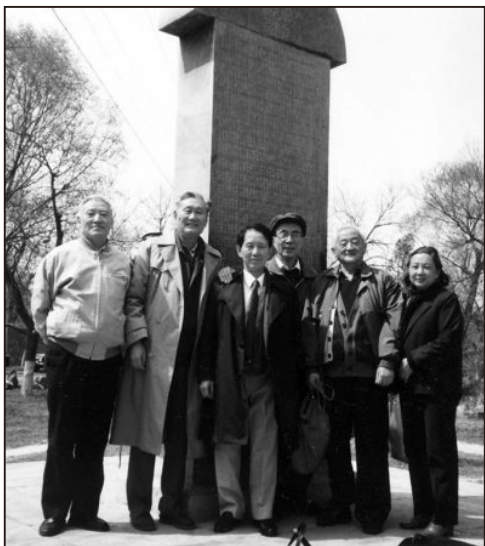


怀念羽纶

○赵景伦（1944经济）

羽纶，即陈羽纶，1917年3月—2010年8月23日，福建福州人。1944年毕业于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81年创办《英语世界》杂志，担任主编长达18年之久，是国内外著名的翻译家、出版家。2003年获第八届中国韬奋出版奖。

羽纶跟我在西南联大是同系同班（经济系1944级），我们有将近七十年的交情。我对他的印象是真不愧他的名字——羽扇纶巾。我指的不是仙风道骨，而是诸葛武侯的忠诚、智慧、潇洒。



1993年于联大抗战从军纪念碑前，左起：李嘉华、赵景伦、陈羽纶、王曾壮、吴惟诚、许冀闽

他的原名是“与鏞”，“鏞”是古字，不认识这个字的人有时误读作与“鏞”，给他加了三张嘴巴。也许是为了避免误读吧，他把名字的写法改成“羽纶”，这一改，改得好，更加符合他的人品性格。

他1950年回国，至1956年历任五十年代出版社总经理、常务董事、编审，时代出版社、外文出版社编辑，1956年转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他长期主持《英语世界》，为国内学习英语的广大读者服务，卓有成效。我姐姐赵萝蕤是这份刊物的顾问，我的老伴张素初曾经多次投稿，把她的中文作品译成英文，中英对照，供读者参考。这本刊物办得有声有色，跟羽纶的敬业精神是分不开的。他亲自主持编辑工作，一直到八十多岁才退居二线。

羽纶还是很有成就的翻译家。我们既是同学，又都毕生从事写作、编译，可以说志同道合。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西南联大经济系是全校最大的系，一班有几十上百人，有的同学四年一道上课，仍然互不相识，而羽纶跟我一直保持着联系。我们西南联大1944级在毕业那年，全体被征调当翻译官，在中印缅战区，为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中美军队充当语言的桥梁。羽纶去了缅甸；我去的是云南驿空军基地。今天，刻有我们名字的纪念碑仍然屹立在母校校园里。我们都还珍藏着跟几位同班同学在碑前的合影。

抗战胜利后，我们又都到了上海，后来又到北京，并且在外文局同事。当时，五十年代出版社是外文局的一部分，我曾多次到他家访问。我们常在一起聊天、打乒乓的还有联大同学王曾壮和夫人著名歌唱家邹德华。

□ 师友情



1997年6月16日于北大燕南园55号探望岱孙师。左起：陈羽纶、陈岱孙、赵景伦

接着来的是十年浩劫，我被打成牛鬼蛇神。羽纶比我更加不幸，无端丢了一条腿。在那个时代是坏人当道，好人受气，没有道理好讲。我们当翻译官，为的是打日本，却被打成“美国特务”，颠倒是非，混肴黑白，多少知识分子受到迫害。

羽纶靠他的义肢，行动不便，却仍然活跃。我长期住在国外，每次回国都要找他。或者参加联大同学聚会，或者探访共同友人。

他有车，我就沾他的光。我们一道去“七重天”看望老朋友冯亦代。那时冯老已娶了赵丹的遗孀黄宗英。两人住在他女儿的宿舍，狭小得转不开身。黄宗英叫亦代“二哥”。我早在40年代就认识冯亦代，我们在上海中央印制厂同事，那时他叫冯亦德，人们叫他“阿德”。因为他是翻译家，跟羽纶有同行之谊。

看望次数最多的是陈岱孙，他老人家是羽纶的远房兄长，我的老师，也是我哈佛的老学长。那时陈总已经退休，住在北大一个小院里。屋里挂着朱镕基送的条幅：“九五至尊”，是庆贺陈总九十五岁大寿的礼物。陈总乘鹤西归以前，我们大

概是最后探望他的学生。

2010年4月，我从纽约回国定居。因老伴生病离不开人，没有去看望羽纶，但是跟他通了电话。谁知那竟是我们之间最后的一次谈话。

回顾这70年，君子之交淡如水。羽纶对工作敬业，对朋友热心，事业有成，又培养了优秀有出息的子女，他的一生丰富多彩。我们之间的友谊可以说心有灵犀一点通。

怀念徐弘微同学

○ 梁润生(1955电机)

去年6月，我去美探亲住在费城南郊我大女柏如家，那时，弘微及夫人沈鑫刚从南欧旅游回美。不几天，他们夫妇就与定居在弗吉尼亚州的张裕才同学夫妇一起从马里兰州远道来与我相会。当时，看到他们精神饱满身体很好的样子，我是多么高兴，弘微一点不像患癌症做过手术的人。他先后到过阿拉斯加、北欧及南欧等地旅游，写下图文并茂细致入微的旅游日记，我以为他的病完全好了。后来我在旧金山小女柏寒家住了三个月，我们经常电话联系，也没有听说他身体不适。

我回国后，他也常打电话给我，他说由国外打到中国的电话费很低。因最近未见他来电话，我两次用skype联系时不见弘微，只见他夫人愁容满面地告诉我弘微癌症复发卧床在家，由医生来家医治，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不安。我想可能不是很严重，因还没有住医院。两天后我又用